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出版视角或者市场乃至阅读层面进行判断,1978年5月在新华书店重新上柜的35种中外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标志,显示了新中国出版进入新时期,开始了“第二个春天”。

1979年,上海科技书店尝试举办了一次图书夜市,4天接待读者1.2万人次,销售图书5万余册,4万多元。1980年上海科技书店假上海体育宫(现在上海大剧院原址)600平方米举办了1980年暑假图书展销,以“丰富师生暑假生活,配合新长征读书活动”为主题,18天售出图书34万册、37.5万元。那时的上海科技书店响应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建设科技现代化作出了贡献。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假如没有这两次尝试,就难有以后的1981年上海书市。

### 1981年

1981年9月6日-20日,上海新华书店主办并邀请上海书店、外文书店参加了在上海工业展览中心技术革新馆(现在的上海商城旧址)3500平方米实用场地举办了1981年上海书市。

书市设七个展销馆:文史哲综合类图书馆,科学技术图书及各类教材馆,上海出版各类图书馆,各省市出版图书馆,音乐(录音磁带)馆,古旧图书馆、外文图书馆。制作了200只陈列橱和89块宣传广告牌,参展书刊2.2万余种。书市发出入场券28万张,接待读者24万人次,销售图书400万册、240万元。档案披露的数据还包括:亏损占销售总额的0.7%,整个书市费用约10万元,净利30多万元。营业时间是上午8:00-11:00、下午2:00-5:00,中午是歇业补架、清理、休整时间,中午停业的做法只有这一次,以后的书市就再没有出现过。为了接待好各地2400多个团体单位采购,专门开设了两个夜场。

当时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一把手”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都先后到书市参观。

当时,场内张贴和不断广播着的“告读者”我近期也从有关档案中找出,虽然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但仍然值得一读:

为了切实维护书市秩序,方便读者参观选购图书,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发了敬请读者协助的7项注意事项:比如“请把拎包放到门口‘寄包处’去,不要带入馆内;对个别有意不付款而将图书带出门者,要加倍罚款。”现在,只有快递而没有寄放处,工作人员也不能对盗书者加倍罚款了,这也算是社会进步的缩影吧。

记得当时,我是这届书市的工作人员,被静安区店选派到文史哲综合类图书馆工作,这个馆由当时的黄浦区店、虹口区店、静安区店协力承办。我服务的是文学书专区,每天的主要任务是配书、上架、理书,那是就业后的第一次大体力劳动,每天精疲力竭。当时的想法只是架上不要缺书,多配点书,反正什么书好卖就赶紧上架。那时,读者争抢《萍踪侠影》、《书剑恩仇录》等,新书一到拆包也来不及,就是发牌那种速度都感觉慢。每天的愉快留在记忆中的只是同事间相互比较管辖的小书柜里库存还有多少?中饭、点心什么时候吃?吃什么?想到这里,我们已经很久吃不到可口、实惠——来自上海新华书店职工食堂的饭菜和点心了。2004年,这家提供了二十多年工作日中绝大部分时间午餐的食堂关门了。想想当初的热闹,有种怅然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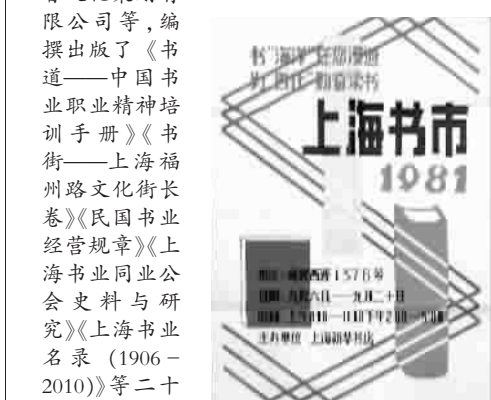
这里,我把这届书市的领导名单抄录一份,因为有着这些老同志的努力,才使我们今天有了更高的立意、更大的作为。

1981年上海书市领导小组成员是:黄巨清、张泽民、宋玉麟、严正、朱顺兴。办公室主任:宋玉麟。

# 一九八一年起经历的上海书展



▲ 1986年上海书市工作证  
▼ 2013年上海书展工作证



▲ 1981年上海书市海报

### 1986年

上海展览中心在上海书业掌门人心中一定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上海人办书市,首选这块场地。这种情绪从1981年开始,到1986年上海书市开始扎根。之后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因为书市而到上海展览中心去。

1986年上海书市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和上海新华书店联合举办,租借了展览中心东一馆5000多平方米开展,9月6日开幕,历时15天到20日结束,这届“登堂入室”的书市在陈列上开辟了10个专业馆、制作了160块出版社宣传广告牌、70只陈列橱、供应3万种图书。组织了教师、大学生、军人、老干部、驻沪人士等六个专场,有3000多家企事业单位派员到书市选书,整个展期接待读者20万人次,零售图书250万册、340万元,被称为“金秋文化盛会”。

这届书市为以后的书市(书展)在设计上提供了两个范本:

一、改革之前图书品种重叠交叉综合分馆的做法,设立的10个专业馆各自独立核算,场内实行超市式的开架售书。

二、书市搭台,出版社唱戏。上海人民出版社《首脑论》售缺后立即派人从装订厂取出2500册直送书

市,浙江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方式送来了3000多套“生活启示录”丛书。开展了作者编者与读者见面会、新书首发式、读书报告会、电视智力竞赛、作者签名售书等18场(次)活动,“把大型书市办成一个文化气氛比较浓的活动是本届上海书市在做法上的一个新的尝试”。

媒体刊发了近百篇(次)的报道、评述。我找到了这届书市的工作小结,其中写到,因为开架售书使书市蒙受的损失是销售总额的0.797%,约27000元。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性格组合论》销出了一万多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学科丛书”中的《关于思维科学》、《领导科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等,分别销售出1000多册到4000多册,十多天的销售量超过了平时预计几个月或一年的销售量。又如湖南人民的“散文译丛”,浙江人民的“生活启示录”丛书,辽宁人民的“面向世界丛书”,天津人民的《当代干部小百科》,三联的《宽容》、《情爱论》,四川人民的“走向未来丛书”,上海译文的《人论》、《猜想与反驳》,上海辞书的《中国古代名句辞典》等,都成了吸引读者争购的目标。

这时,我已在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谋职,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印制各种宣传品、塑料袋、广告发布和一些活动的组织联络。在书市组织构架中,我属于宣传组,在多位前

辈的带教下承受了不少压力也获得了许多经验。

### 1990年

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新华书店总店、上海新华书店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书市1990年8月3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二层的6300平方米的展厅开幕。以二层中厅入口为序馆,设计了十二个展馆。读者进场参观序馆后从第一馆折返第二馆,可以顺道参观至第十二馆。整个书市配备了58只陈列橱、450块分类牌及250块宣传广告牌。

一本《书的魅力——第三届全国书市综观》(陈致远、臧受仪主编,我责编,学林出版社1991年3月版),使我们在相隔二十多年后仍能获悉其中的真实:“这届书市的宣传组,共提供了1800件广告衫、1万张海报、30万张入场券、1500张开幕式请柬、1500张团体单位请柬、30万张包书腰封、20万张包书封口粘贴纸、11万只塑料袋、1万张年历卡、800支圆珠笔。”这些数据,现在看着有点乏味,但正是这些数据才构成了书展的魅力。

8月30日乃至之后的13天里,上海展览中心出现了书潮、人潮涌动的热烈场面。被媒体称为“使全国出版界感到震动”的这届书市共接待了22万人次,零售各类图书145万册、524万元。

这届书市,我以宣传组副组长(组长周松柏老师)从事书展整体策展、主体活动、宣传推广甚至业外广告招商、宣传品制作等工作,书市结束时进行了“好新闻”评比,姜小玲、房延军、查志华、褚钰泉、徐坚忠、朱伟伦、林伟平、郦国义、徐福生、陆谷苇、赵兰英、陈文、李仁达、王文煜、郑丽娟、刘文仪、萧楚章等记者获奖,在之前的多年和之后的很多年,这些记者一直与我有着很好的联系,我也曾多次获得上海“三报两台”“统吃”的优秀通讯员。

### 1996年

仍然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仪式,展出面积6300平方米,汇集10万种图书、音像制品的“首届上海图书节暨‘96上海书市”,1996年8月9日至18日举行。

此届书市以首届上海图书节为主题名,书市设了16个展馆,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办公室工作班子仍由新华书店阵营组成。10天的书市接待读者30万人次,销售达1100万元。书市期间的畅销书榜首:钱宁的《留学美国》销售6000多册。

书市期间举行了50项文化色彩浓厚的营销活动,包括首次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版报告会、上海十大藏书家评选、上海图书经营者愿天下儿童人人都有书读捐一本好书、世纪之交的上海出版物拓展内地市场前景分析研讨会、电子出版新趋势演讲会、上海版百种期刊封面展示暨上海期刊优秀封面评选、上海出版成就展等。还评出上海十大藏书家:叶中豪、陈子善、吴钧陶、张荣明、金文明、陶顺良、梁国强、曹正文、蓝凡、瞿永发。

这届书市从书市设计的角度来说,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表明书市开始大面积运用设计的概念,人们对书市的看法除了要求场地好、书多之外,还开始从展示的角度欣赏、

品味了。这届书展,因为我的老科长周松柏退休,书市办公室宣传组也改名广告宣传部,我出任了部长,从事着活动策划、报道联络、广告发布、场地布展乃至活动组织等工作,后期还协助赵建平主编了《共享书香——首届上海图书节综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

### 1998年

第二届上海书市1998年12月30日至1999年1月8日在上海书城举行(上海书城同时开业),名称沿袭‘96上海书市而称第二届。

因为上海书城的建成,使书市可以不租借场地,还可以使几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一个“永不落幕的书市”成为了现实。

这届书市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由上海新华书店、上海书城等六家书店承办,所有关注点都在上海书城,1月1日接待读者2.45万人次,1月2日销售83万元。同时,福州路文化街大型书店、专业书店以及全市各家新华书店同时开设分会馆,嘉定还设立了农村分会馆,汇集了15万种图书、刊物、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在上海书城大放光彩。整个书市总销售1073万元,接待读者81万人次。

本届书市推出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85项,数量和内容均超过了在上海举行的历届书市,被誉为年终岁首上海最亮丽的一道文化风景线。这些活动将图书展览与文化导读、社会公益、学术研讨、专题展示有机结合,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百余位中外著名学者、作家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在书市期间推出个人最新的学术文化成果交流、签售。

本届书市因为有着上海书城的支撑,使原先留在人们心目中的书市发生了变化,这种固定、持久的书店风格与书市原有的布展概念完全不同。好在上海书城的环境被人们轻易地接受了。当时就有人说,有了上海书城以后如何再办书市?

我在这次书市仍然位列宣传组,前面有阙宁辉、周兵两位处长领衔,我的一部分工作转移到我主编的《上海新书报》上了。

### 2001年

时间转了三年,到了2001年12月28日,随着东方书城、东方出版交易中心的开业,仿照两年前的案例,上海读书节暨第三届上海书市合并同时举行。

这时的上海读书节暨第三届上海书市早已被东方出版交易中心的概念所影响,以书城的设计和布局而言,东方书城超过了上海书城,东方出版交易中心更是制造了一种理念、一种寄托信息做大交易的思路。

10天的书市,进行了双城联展(东方书城、上海书城)、全市200家书店展销、文化大餐专列发车、为农民兄弟送春联、反盗版知识展、科技出版百年回顾展、二十世纪出版成就展等以及众多名人的签售活动。销售总额2200.79万元,东方书城接待读者50万人次。

我当时既负责宣传,又是《上海新书报》总编辑、上海书香广告策划公司总经理,很多事情都从头至尾通宵达旦地完成。我的三十多位同事也一直在“自负盈亏”地工作着。

从1981年到2001年的二十年间,上海举行了六次大型书市加上文汇书展、浦东书市以及各区新华书店、专业书店举行的定期、固定书展(书市),使上海读书人的感觉一直处于欣喜、等待、盼望之中。因为有了上海书城、东方书城,买书似乎日渐容易,书市这种以卖书为主由大众参与的文化活动是否还有升腾的空间?也是我在之后几年间思索的问题,2004年我又参与了上海书展的筹备,从那年开始,又已十年……

举目而望,我已是少有的自1981年上海书市开始一直戴着“工作证”的工作者……